

澳大利亚当代作家梅丽莎·卢克申科访谈录

韩静

梅丽莎·卢克申科简介

梅丽莎·卢卡申科(Melissa Lucashenko)生于1967年，是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同时是当代文学中最重要也最具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以小说和散文著称，作品屡屡获奖。1997年梅丽莎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格格不入》Steam Pigs，获得了澳大利亚女性小说奖多比尔文学奖，并入围新州州长文学奖。第二年又发表了第二部小说《杀死达西》Killing Darcy，获得极光奖。2013年梅丽莎的第五部小说《穆伦宾比》Mullumbimby 获得了维州州长文学奖和昆州小说奖。梅丽莎的新作《多嘴多舌》Too Much Lip 获得了2019年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得此殊荣的原住民作家。与此同时，这部小说被一家影视公司购买，正在改编成电影。

梅丽莎·卢卡申科出生在澳大利亚昆州首府布里斯班市远郊，其父亲是俄国难民的儿子，母亲是混血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属于邦家仑 Bundjalung 民族。梅丽莎的身份认同来自于其母亲家族。原住民的身份由于白人占领原住民土地的历史原因，并非只是由血统和肤色来决定，而是基于对原住民文化充分融入的程度以及跟世代家族的纽带。梅丽莎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最小的一个，当初她母亲被迫将他的大哥藏起来，担心会被政府强行带走，放在白人家中寄养以到达被同化的目的。因为家境困难，梅丽莎从15岁就打工接济家中。她19岁进入克利菲斯大学，获得公共政策学士学位。

因为看到澳大利亚文学中对于原住民生活的描述甚少，而原住民作家更少，梅丽莎9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她多年来坚持的目标是书写普普通通原住民不普通的生活经历。她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带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梅丽莎非常有个性，生活经历多样又丰富。她从小练空手道，拥有空手道黑带，并且五次荣获昆士兰州空手道大赛冠军，三次获得全国空手道荣誉称号。她还在2014年澳大利亚最有名的电视知识问答大赛《百万富翁》中获胜。她有着非常强的正义感，积极为原住民，特别是原住民妇女和其他受到边缘化的女性的权益做不懈的努力。都说文如其人，梅丽莎随性和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她特有的幽默都体现在她的创作中。

《多嘴多舌》的特别之处是作者以鲜活、犀利又带有黑色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原住民在当代社会中的生活，以及原住民文化与传统与现实激烈碰撞的画面，主题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得以深入的表述。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韩静教授，同时也是小说《多嘴多舌》的译者，针对2019年获澳大利亚文学最高奖的小说《多嘴多舌》，同作者进行了以下的访谈。

访谈于2020年2月16日下午6点在悉尼进行

韩静：梅丽莎，你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你做这个访谈。首先我想问的是有关你个人的身份问题。你在杂文《白肤色》中提到，你十几岁的时候，并不知道你的原住民身份，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因为你有一半是白人血统，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混血的原住民，所以只从肤色上看不出来你是原住民。直到你 14 岁那年，你母亲才第一次对你坦白你的原住民身份。请你谈谈你的身份发现历程以及你成长的环境。

梅丽莎：我在布里斯班郊区长大。我是家中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上面有六个哥哥，我很小的时候，大哥就已经离开家了。我上的是普通的公立小学和中学，16 岁离开学校打工，后来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去上大学，我其实也不知道去大学去能有什么用，但还是申请了，并得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我明白上大学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上大学改变了我的一生。

韩静：那个时候原住民的孩子们上大学的人数多吗？

梅丽莎：我今年 53 岁，上大学时 19 岁，当时我是属于格里菲斯大学第一批原住民大学生，共有 30 多名，上大学不很稀奇，但没有今天这样普遍。我主修的是公共政策和经济，本来想着毕业之后开个小生意，但毕业的时候我对政治、哲学、社会学和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上大学对我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我成长最重要的几年当中，我同其他原住民学生共同学习，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原住民文化和传统，成为他们当中很多家庭中的一员，我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

韩静：当你母亲跟你说你是原住民时，你感到吃惊吗？

梅丽莎：当然吃惊了。我一直不知道我们家哥哥们和我是原住民后裔，我小时候就以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肤色，有的人肤色很白，也有的是棕色，头发也是各种颜色，有带卷的有不带卷的。上世纪 70 年代时昆士兰政府停止了同化原住民的政策，但还在以其它形式将原住民的孩子们强行带到白人家里寄养，而这些原住民家庭完全有能力抚养自己的孩子们。当时的人们很少谈论种族，也不会有人问你这类的问题，除非是有意的种族歧视。我只知道我们跟其他澳大利亚人一样，要是再有人追问，我就会说我们有俄罗斯血统。所以当我母亲说我们是原住民时，我才恍悟为什么我的肤色是浅棕色的，我们有着棕色的眼睛。我也突然明白为什么在学校里我一直觉得我跟其他蓝眼睛金色头发的同学不同。但很难辨别这种感到不同是因为我母亲是原住民，还是我父亲是俄罗斯移民，也许是两者都有吧。

韩静：那发现自己是原住民对你的身份认同有什么样的影响？

梅丽莎：这个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的。那个时期我非常热衷于练空手道，我练了有 10 年，多次获得昆州的冠军，18 岁拿到黑带。所以 14 岁的我一门心思都在空手道上，空手道成为我的替代身份。那时候我对种族的问题没有什么兴趣或感觉，或者说处在中立的状态。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我把我母亲说的话告诉了我的中学同学罗尔·奥康纳时，我第一次知道罗尔同我一样也是原住民后裔。有意思的是我们家跟罗尔家关系非常好，尤其是我的哥哥们跟他的哥哥们，犹如亲兄弟。回头来看，这并非偶然，我发现原住民家的孩子们会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即便是他们不知道对方是原住民，这主要是因为一种内在的和谐感知。

韩静：那么可以说身份的发现将你跟原住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或者说原住民的世界拉的更近了？

梅丽莎：肯定是激化了我的兴趣。虽然我的身份被隐瞒，但我从小生长在原住民的价值观中，比如信奉人人均等，跟自然保持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从很多小事上学到的道理，例如不把一颗树上的果子都摘光，每次留一些为了再生长；还有毫不吝啬地分享自己有的东西，等等。

韩静：那你生活的环境是基本上以原住民为主的社区吗，还是什么人都有了的多样化社区？

梅丽莎：离我们最近的原住民就一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罗尔一家。住在社区的多是主流的澳大利亚人，还有一小部分亚洲和欧洲来的移民。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布里斯班的这个区，也是绝大部分是白人，有一些亚洲和南非移民。我成长和后来居住的都不是以原住民为主的社区。但是自从我知晓了我的真实身份之后的 30 多年当中，我的原住民认同得到极大的增强和深入，我跟居住在附近的原住民家庭交往密切，也成为布里斯班原住民社团的一员。

韩静：谈谈你父亲，他对你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有影响吗？你觉得你了解你父亲吗？

梅丽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父亲一直都是在跟前的。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奶奶从西伯利亚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父亲对我的影响肯定是有的。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受到很多的种族歧视，被辱骂为欧洲来的蠢货，他一辈子都做蓝领工。他最后融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同时，还保留着他的俄罗斯传统，所以我说他有两个灵魂。同时他也在澳大利亚丛林干活，所以对丛林文化和原住民文化也有所了解，他是个混合体。问到我对父亲了解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父亲 2010 年去世了，但我对他的了解还在继续中。在他的葬礼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大意是“取了澳大利亚的名字，安了澳大利亚的家，淌着俄罗斯的血脉，长着俄罗斯的筋骨”。我父亲的生活经历很复杂也很坎坷，遭遇了很多的暴力伤害，他自己也成为暴躁的人。他从来不谈及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的暴力行为，他母亲不得不把他和他的弟弟送进孤儿院一年。我想他在孤儿院的遭遇恐怕使得他终生难忘。

韩静：这些经历也在你的写作中有所反映，对吗？

梅丽莎：是的。

韩静：你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你 90 年代拿起笔写小说的原因，你说“当时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就是只有极少数的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得以出版。”当然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你还特别提出，作为一个原住民，主要的链接是文化和家庭的链接，而不只是限于血统。那请问你是如何定义原住民写作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的？

梅丽莎：在我看来，原住民作家就是有原住民血统并且认定自己是原住民、跟原住民社团有着紧密联系并被原住民接受的作家。至于什么是原住民写作，我想采用一个广义的定义，即凡是原住民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算作原住民写作。

韩静：为什么对于大多数的外人来说，对原住民的认识很狭义和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梅丽莎：这是因为两百多年的殖民历史和种族歧视所导致的，澳大利亚刚刚开始懂得原住民所拥有的是错综复杂而宝贵的文明，并且有着几万年的持续性，而在这个国家里他们遭受残酷不公的待遇 200 多年，很多年来白人一直不认为原住民是智人，而是亚人类。对于国外的人来说，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了解也很少。事实上在澳大利亚直到最近一直都在实施精神上并且也常是身体上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以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眼里，我们原住民仍然像是迷。

韩静：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把你和你的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你提到原住民写作，你是指作品必须是有关原住民，他们的文化和生活吗？原住民写作必须有别于其他澳大利亚作家吗？

梅丽莎：无论是否描写典型的原住民人物或生活，原住民写作一定有别于其他写作，因为我们是透过原住民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作家，例如德国作家，或者中国作家，以及英国作家。这跟摄影是同一个道理。塔斯马尼亚原住民摄影师里奇·梅纳德说，他能从照片上看出摄影师是不是原住民。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

韩静：作为原住民作家，你的作品都是有关原住民的故事吗？

梅丽莎：是的，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作品都以原住民为主题。

韩静：在发表《多嘴多舌》之前，你出版了《穆伦宾比》，小说非常成功，获得了昆士兰州文学奖。故事定位在现代社会，但以古老的土地为背景，如你所说，你的所有作品都是反映原住民现代生活的一种版本。《穆伦宾比》故事的设定成就了其主流社会的成功，但是在那本书之后，你决定写一篇完全不同的小说，讲述一个“犀利的故事”，一本“让主流社会里很多人都会有意见”的小说，甚至有可能引起来自原住民社区的反冲，一个让你写的时候感到“心惊胆颤”的故事。这可以说是你写《多嘴多舌》的初衷和忐忑的态度。你调侃地说“我仍然在等待在一个没有月光的漆黑夜晚，有人照着我的头部猛砸一棒”。可以谈一下为什么写作这本书带给你担忧和惧怕？

梅丽莎：回答这个问题不剧透恐怕有些困难。当我谈到写这本书胆战心惊时，澳大利亚主流读者和批评家会以为我是在说因为我在书中表现出对白人社会的不恭而害怕遭到批判，完全不是，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惧怕，我根本不在乎，因为直到今天，我们原住民还在受到白人警察无故的驱赶和追杀。所以如果白人读者对我在书中表现出的对澳大利亚种族歧视粗野的态度和强烈的谴责感到不满，丝毫触犯不到我。我所恐惧和担忧的是，我是否有足够老练的写作技巧和能力来公正地描绘原住民的生活，而不会意外地协助了白人将原住民人物妖魔化。这是我最担心会发生的，但同时我也需要从各个方面来审视和表现原住民社区，包括丑陋的一面。

韩静：《多嘴多舌》发表之后，受到大量好评，被很多文学批评家称赞为一本“无所畏惧”，“坚忍不拔”，“毫不退缩”的小说，同时又是一部让人忍俊不禁、开怀大笑并且非常暖心的作品。最令人喜悦的是《多嘴多舌》获得了2019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澳大利亚最高的文学大奖。你对澳大利亚读者和批评家对这本书的反响以及获得这一文学奖感到吃惊吗？

梅丽莎：在宣布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之前，《多嘴多舌》入围了另外几个文学奖，我就想这本书还算是成功吧，但也许故事的基调不符合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口味。就在最后宣布获奖决定之前，我还在跟《澳大利亚人报》的批评家斯蒂芬·罗文说我感觉我不会获奖，因为我的小说没有遵循传统的欧洲小说的风格，我还说希望有一天能写一部那样的小说。当得知我获得这项国家文学奖时，我实在是高兴得难以自禁，就好像第一次发表作品一样，就觉得我的书出版了，谁也拿不走了，成为一个正式的作家了的感觉。可以说迈尔斯富兰克林奖极大地促进了我的自信心，改变了一切。亚历克西斯·赖特是第一位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的原住民作家。我得奖的第二天，她给我打来电话，她跟我说，她获奖一年之后才认识到得奖意味着什么。我非常高兴她告诉了我她自身的体验，我现在就知道了，需要时间来发现获得这项大奖对我的意义。

韩静：你认为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意味着《多嘴多舌》成功地讲述了原住民的故事，而没有使得原住民被妖魔化？还是这一点仍然很难断定？

梅丽莎：我当然希望如此，但也觉得很难确定。我深有体会的是，永远不可低估在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还有一点是，作家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路子写，而读者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我写作的时候总会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的。所以说写原住民的故事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外人写不好原住民的故事，因为他们不了解澳大利亚对于原住民的种族歧视，以及原住民的历史，而只有我们原住民懂得和体会的到。那么我在写作的时候，就会在揣测非原住民读者的心思上特别下功夫，就好像下象棋，我需要从对方的角度出发，非常策略地计划和设计我的写法，同时又要把故事写得很有趣，很有意思。

韩静：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多嘴多舌》。你说这本书的本意是向权力诉说真相。这个故事讲的是原住民社区中代际之间的创伤及其导致的家庭暴力，是一个让人很难直面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蔑视和挑战的故事。这种蔑视也表现在作者的态度中，直视真相的残暴，以毫不退缩的笔触描绘暴力和创伤。那么你是想给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梅丽莎：在我之前所写的作品当中，从未出现过主要的原住民人物遭遇死亡的情节。之前我的焦点在于表明我们的文化是生命不息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没有消亡，我们生存在澳大利亚的每个角落，尽管我们看上去、听上去以及我们的思维跟大家想象中的原住民不一样。但自从我写了《穆伦宾比》之后，我对我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有了更大的把握，所以我决定我要让我笔下的原住民人物拥有四样东西：第一有美，第二有权，第三有幽默，第四有土地。最近我又加了一条，有爱。这五点美好生活的必备条件和元素，而在白人进入到这个大陆之前，原住民的生活具备这五项，美，权，幽默，土地和爱。我们的祖先的生活富足而美满。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给我的读者的内容，使得他们懂得我们原住民的人性。

韩静：你是作为原住民作家从内向外讲述这个原住民家庭及其历史和其所处的社区的故事。为什么由一个知晓内情的作家写这部作品尤其重要？

梅丽莎：因为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故事，而白人写的有关原住民的故事都有可能对我们造成损害。白人作家不可能写原住民的故事，他们所了解的原住民故事只限于 200 多年来在种族歧视生存环境下的原住民，而这一点一直都不受到承认和了解。我非常主张原住民作家跟其他作家的合作。对非原住民作家，我的主张是，你尽可以把原住民写入你的故事中，但只是作为配角，而不能作为主要人物，因为你不可能做到准确的把握，在不能够正确体现人物的过程中，你会造成对人物和初衷的损害。就好比一个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历史、环境、生活等等没有深入到内部的了解，他不可能造就出准确的中国人物的形象。

韩静：这部小说的故事描述的是居住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乡村、处在下层阶级的原住民的生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是书中原住民并非生活在遥远的地区和神话般的时代，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原住民在大家非常熟悉的 2018 年当代社会中的当下生活，与此同时在普通生活的表面之下是书中人物所居住的现代社会与追回他们失去的远古土地的诉求在时间轴上的冲突或者不协调。那么这种冲突和不协调的基调是否定义或者奠定着原住民的生存条件？

梅丽莎：我认为是奠定了原住民的生存条件，也是这本书的主题之一。美国小说家简·史麦利说过的一句话让我牢牢记在心里，她说小说的前提是描述的景象并非与看上去的一致。就原住民社会来讲，所看到的和实际的相去甚远。从文化上看，很多现象有着多层表面上看不出来的知识和意义，以及原住民文化特有的隐喻。作为一个原住民，成人的标志就是学会和理解多层知识的细微之处。在这本书中，有些层次的意思只有邦家仑民族的读者可以看得明白，有些层次的意思只有其他原住民可以领会，还有一些层次的意思是澳大利亚及其大众读者都可以捕捉得到的。比如，书中有个情节是索尔特家的大哥肯尼不同意给他的少年儿子纹身，说他还没有准备好。大众读者会以为肯尼是担心儿子怕疼，澳大利亚原住民读者会明白有更深层的意思在里面，而邦家仑民族的读者则很清楚其中的原因。

韩静：所以你是说不同的读者，所看出的故事的意思和深度也有所不同？

梅丽莎：是的，这就是传统原住民的写作方式，据我所知，欧洲很多民族也是如此。例如原住民的民间传说，很多人以为是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但其实这些故事有很多层的内容在里面。而澳大利亚主流并不了解，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有关这些故事的教育，也不懂我们的语言，所以只是看到孩子层面的故事。

韩静：你聚焦原住民现代生活的描绘，目的是反驳原住民是行将消亡的民族的论调吗？

梅丽莎：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原住民都生活在现代社会，有一部分原住民英文不好，或者不会讲英文，但是他们是少数人。绝大部分的原住民的第一语言是英语，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现代科技，比如 FaceTime 一类的新型交流手段。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践行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保持我们的价值观。

韩静：你在书中对暴力的描述毫不退缩，从历史时期的种族灭杀，到家庭暴力，代际创伤，以及受到暴力和酗酒损害的年轻一代。当家族史中令人不堪的秘密被揭开时，连最彪悍的肯尼都承认，“这个真相，真他妈难以入耳。”你认为救赎是可能的吗？

梅丽莎：首先不是每一个原住民家庭都出现这样程度的暴力。其次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讲救赎，讲愈合。我们的家庭和社区有帮助救赎和愈合的手段。但是因为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总是通过负面的模式和镜头来衡量原住民，给原住民安上了无用、懒散、酗酒等有害的标签，使得我们无法进行疗愈。我们想要管理自己的事务，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在白人侵入之前，我们管理自己的土地几万年。种族歧视是最严重的阻碍，种族歧视一贯的观点是原住民没有文明，对宇宙只有简单的认识。而事实是他们对原住民的了解太少，达到了解的鸿沟有多大，很难表述。

韩静：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很多，主要围绕索尔特一家以及跟他们有紧密联系的人，而所显现的是鲜明而非常动态的原住民生活的画面，他们所面对的个人、家庭、社会和历史问题错综复杂的交错。主要人物，索尔特家的小女儿凯瑞，在故事的结尾时说“寻望着烟雾中的每张脸，凯瑞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想问的是，原住民的身份追寻与发现是原住民写作中的持续主题吗？

梅丽莎：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1988年，西澳的原住民作家莎莉·摩根发表了传记小说《我的位置》，讲述了她从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份到发现是原住民的历程，跟我自己的经历很相似。自打那以后，澳大利亚主流读者都会按照这个视角阅读每一本有关原住民的作品。在我的这本书中，凯瑞对自己身份产生的疑问是她得知她的血统跟镇子上某个白人家族有联系，除此之外，这本书中的所有人物都对自己原住民的身份没有任何的迷茫。

但是读者常常用莎莉·摩根的故事来套读所有的原住民故事。比如有人跟我说，我写的《穆伦宾比》展现的就是一个寻找身份的故事，而那本书的主角很明确地知道她是原住民，她对自己是邦家仑民族的身份没有丝毫的疑问。原住民的身份会是我的以及很多原住民作品的中心内容，因为这是历史上种族灭绝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够在没有身份挣扎时强加这样的视角。

韩静：讲到《多嘴多舌》，不能不说到其生动、独特的语言，充满了原住民的俗语表达。很多评论家说这本书透着令人难以直面的坚韧，同时又充满了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可以说黑色幽默是贯穿整个故事的基调，使得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紧张又投入。为什么黑色幽默和土著黑人幽默在这本书里如此重要？

梅丽莎：这正是这本书的地道所在，是对原住民家庭的真是写照。可能很多澳大利亚人以为我们就是整天坐在那里愁眉苦脸，或者是喝得醉醺醺，其实在原住民的生活中的欢笑远远多于很多人生活中的欢笑，我们是从几万年对生活和对自然的观察中汲取用之不竭的材料。原住民常常滑稽到无节制。

韩静：那么滑稽和幽默同时是否也是一种表示蔑视的本能？

梅丽莎：是的，特别是对于贫困的原住民来说。当你一贫如洗时，你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你就可以想怎么逗乐都没问题。我想这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同样吧。

韩静：这本书的题目《多嘴多舌》，是不是有两层所指。一是说主人公凯瑞，她的老毛病就是喜欢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服气，爱抬杠。二是指作者本人，不畏惧，喜欢多嘴，一定要表达自己的看法。

梅丽莎：对，其实这句话是引子我的一位朋友，他是约克角的一位长老，我跟他耍贫嘴，他带着赞赏的口气说“你这个丫头，就爱多嘴多舌。”我使用这个标题还有第三层用意。在我看来，澳大利亚还是个年轻的国家，就好像青少年时期，还没有完全进入成熟的成人社会。意见很多，口出不逊，爱顶嘴是青少年的特性，所以使用这个标题很对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口味。

韩静：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将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你想对中国读者们说些什么？

梅丽莎：我就希望中国读者了解到我们仍然生活在这里，我们即现代又古老，这一点恐怕跟中国人一样，过着现代生活，但根却非常久远。而根非常之重要，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当下生活中。希望中国读者喜欢这本书，让它成为畅销书。

韩静：梅丽莎，再次感谢你。